

# 逃离与眷恋：柔石小说创作中的精神流浪现象

陈力君

(浙江大学 艺术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流浪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命体验。五四运动时期,文化的裂变带来了精神的无根感,流浪遂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主题。集体的无意识情感和个体的漂泊经历造就了柔石的流浪情结,物质困窘和意义困惑的人物共同组成了现代小说的流浪者形象。柔石小说中的人物构成了“精神荒野旅行者”系列。这些在苦闷中徘徊却依然顽强寻路的精神浪子,共有着一种“逃离与眷恋”的心理模式,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背井离乡又重归故土;(2)追求爱情又拒绝婚姻。

**[关键词]**流浪意识;精神浪子;逃离与眷恋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4-0101-07

就一般意义而言,流浪是对无固定居住场所、无固定谋生方式的生存境遇的通称,是在结构相对严整的社会中,某一个体出于某种原因或为了某个目的,脱离生存单位或组织,背离社会规范或准则,选择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独立生活方式。流浪这种行为方式自古就有,并经常被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安全因素而受到贬损甚至打击,无法得到社会主流观念和道德规范的认可。它犹如化学结构中围绕原子核运转的外层电子,最易离开原来的位置而促成新结构模式的产生。事实上,流浪现象与时代的更迭、文化的变迁有着内在的关联,特别是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流浪现象日渐增多。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文明的变异日趋显著,流浪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并逐渐地由个体行为现象上升为普遍的精神现象,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命体验。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1)漂泊感。流浪者生命形式存在于路途上,流浪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的生存境况,这使流浪者更容易感受到生命的短暂易逝和飘忽不定。(2)边缘感。流浪者选择了迥异于群体规范的生活方式,这注定了他们与社会或团体主流的不一致,注定了他们远离群居生活、社会中心和主流话语。相对于稳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他们的自我放逐造就了心灵边缘化的态势。(3)孤独感。边缘的感受使流浪者在反观尘世时与世俗形同陌路,缺少与社会中心的情感共鸣和理解,他们自觉地被漠视,同时也漠视他人,特定的思维方式阻隔了他们与群体的沟通。

五四文学为流浪者展现其生命形态提供了表演舞台。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加快了中国向现代文明转换的步伐。经历了文化裂变后,具有敏感气质和明锐洞察力的知识分子已然深刻地感受到,原有社会规范中的思想观念体系已经无法对变化了

**[收稿日期]**2002-10-24.

**[作者简介]**陈力君(1970-),女,浙江平阳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系教师,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研究。

的文化现象加以评点，文化的无根感促使他们去追寻新的价值取向，确立新的意义体系；但是，他们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建构起适合新秩序的、能指导人们立身行事的价值标准，茫然、无措、不安、困惑侵扰着他们，试图逃离群体、疏离中心、对抗规范和进行自我放逐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五四时期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有着此类心态的人群和此类人群的心态在作品中展现了出来。流浪是体验生命的方式，有着贴近天地的便利，有着遥思冥想的自由，许多作家选择这样古老却可靠的方式来探究宇宙和生命意义，寻找人生答案，由此，流浪也就成为五四文学中一个瞩目的主题。郁达夫以其感伤浪漫诉说着流落在异国他乡的青年知识者的苦闷和辛酸；田汉以一系列精神漂泊者的形象表达了对艺术和爱情的追求；鲁迅以不断前行的“过客”形象反映了对精神路途的迷茫和探求……流浪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文化心理，表达了求索的痛苦和徘徊，直接影响了在五四这一特殊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青年的心灵世界。

柔石作为直接承受五四精神文化洗礼的青年作家，他创作中的精神流浪现象首先来自于时代氛围的濡染。五四带来的“文化地震”对柔石产生了极大的诱惑，他曾因退学回家而变得心情郁闷，“那时的柔石，有着少年人的勇气和豪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向往”<sup>[1]</sup>(p.7)；他在日记中也多次提到了要到海外去的意愿，无奈囿于生活的压力而无法成行。探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成了五四时代青年的共同情怀，社会没有提供现成的人生答案，寻找答案本身显示了勇气，也饱含了寻找的茫然和痛苦。面对现代文明带来的社会变化和观念更迭，柔石的心灵产生了激烈的动荡，他不断地感到困惑、压抑、焦虑、无助，他在小说中以精神流浪的方式刻画了生命的律动，描摹了心路的变迁。

长期漂泊的生活也加深了柔石的流浪意识。家境的困窘、生活的困顿、现实的困惑，使柔石不得不一次次地屈就于生存的需要，过着辗转迁移的生活。他在杭州求过学，在北京读过书，回家乡当过小学老师，做过中学校长，后又被迫离家避难上海，从来没有稳定的生活。他深知生存的欲求与灵魂的孤独交织在一起的流浪感受：“我又漂流至此了！为食物所诱引，物质的势力的侵入，左右其存在目的的东和西，使其生活之变态。人类呀！你不过是一只没翅膀而飞行觅物的禽类罢！太苦了！消失了真正的主宰力。”<sup>[2]</sup>(p.95)无法寄托自己挣扎的灵魂，四处飘零，这就是柔石真实的生存状态，也是他真切的内心感受，同时也是柔石对生活和思想作出的深刻反思。

## 二

五四时期，人们普遍地感受到社会变迁带来的困惑，并产生了摆脱困惑的要求。“我们的生命之船是在一条永远不断流淌的河流之上航行的”<sup>[3]</sup>(pp.46-47)，“生命是一种处于盲目而又有秩序的不断流变之中的不可抑制的永恒冲动”<sup>[4]</sup>(p.33)。现代社会中，主体与环境间的和谐圆融已经不存在，人们注定无法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只能在浊世中接受灵魂漂泊的命运。中国现代文学中大量流浪形象的出现，代表了人们对理想幻灭、信仰迷失的现代人命运的直观认识，也打破了古典小说原来完整、稳定、统一的人物形象塑造方式。支离破碎、荒谬不经而又不可捉摸的现代性的切身体验，从流浪这一具体的行为方式上得到了验证。当时的许多作家选择了流浪这种方式来展示生命流动，传达对人类存在的思考。从“流浪文学”形成的动因来看，存在着两大倾向：摆脱物质困窘的流浪和解除精神困惑的流浪。前一倾向的流浪原因主要来自于生存的压力，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流浪者是在为讨生活而奔波。这类人物形象承受的强大的生存压力决定了他们只能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流浪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成了他们的身份标记，他们渴望有安定的家园，有精神的依托，在流浪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对人生意义与价值进行思索。但是，作家更多的却是着力描述他们的行踪和生活际遇，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艾芜的《南行记》和钱钟书的《围城》；后一倾向的流浪来自于精神意义的危机，来自于价值追寻的茫然。现代文明的人生荒原感受，使人们更主动地选择了流浪生活。20世纪前

半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面对真实情境与理想预设的无法和谐统一，许多知识分子感到缺少社会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他们自我认定为边缘人，在无休止的运动中找寻价值建构和意义体系，郁达夫的行旅小说、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无名氏书稿》等作品中的形象，都在为寻求信仰而体验着生命在旅途中的种种磨难。

柔石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感受来阐述他的流浪意识，他笔下的流浪者形象大多精神困惑，构成了“精神荒野旅行者”系列，现实生存困境往往被推至背景。这些精神苦闷的寻路者，远离社会中心的精神浪子，他们有追求但不知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有反抗现实的想法但却没有切实的反抗行为，试图寻找人生的道路但又不知路在何方。在柔石最早的短篇小说《疯人》中，疯人是一个“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生身父母是谁”、“自幼即在街坊飘泊”<sup>[5]</sup>(p.430)的孤儿形象，但柔石没有渲染人物的悲苦身世，而是着重刻画他的精神困苦。当疯人发现了爱人“伊”，自以为处于人间不再只有“空”，然而当他生命中的惟一寄托——“伊”的爱远离他而去后，他只有以“疯狂”和“死亡”这种极端的方式完成最后在人世间的流浪。《生日》中的萧彬对于命运的感受是“在困顿与漂流的途中”，“生之幸福同样地流到飘渺的天边”<sup>[5]</sup>(p.513)。《一线的爱呀》塑造了一位浪游青年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执著。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的主人公朱胜瑀是一个离土别乡、历尽生活变故和情感沧桑的知识分子，他“一如歧路上的过客，看不到自己的前途”<sup>[6]</sup>(p.142)。我们熟悉的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中的萧涧秋则是在时代边缘徘徊的浪子形象，“风萍浪迹，跑过中国的大部分的疆土”<sup>[5]</sup>(p.58)，当他“带着我自己的影子伴个别处”<sup>[5]</sup>(p.90)，来到平静、安宁和封闭的芙蓉镇，预备停下流浪的步伐，栖泊他疲惫的灵魂时，与原先的个性产生了抵牾，“只觉自己在旋涡里边转”，自遁之后，完全是指找到自我的全新感受：“现在，我是冲出围军了。我仍是两个月前一个故我，孤零零地徘徊在人间之中的人。清风掠着我的发，落霞映着我的胸，站在茫茫大海的孤岛之上，我歌，我笑，我声接触着天风了。”<sup>[5]</sup>(p.184)萧涧秋此时的心情与在芙蓉镇时的忧郁、徘徊、痛苦、困惑简直判若两人！甘愿“孤零零地徘徊在人间”，拒绝拘限，这才是萧涧秋真正的精神需要，因此，就不难理解他在芙蓉镇的苦恼和最后的逃离了。流浪的生命固然需要暂时的歇脚，但无法容忍从此止住流浪的步伐。至此，流浪者的生命魅力在永远无法安守的流动中体现了出来。这些流浪者形象代表着被五四精神唤醒的时代青年，他们面临着中国传统体系的真正解体，时时感受到文明急遽断裂带来的寂寞、空虚、迷茫、困惑等种种生命体验，他们以自己流动的生命记录了柔石及同时期的知识青年所承载的无可推卸的时代压力，所经历的超越时空的灵魂探险。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的一篇经典小说，控诉了非人的典妻行为，描述了底层妇女的困苦，即使在这样立意明确、倾向分明的作品中，流浪这种深层次的创作心理也还是在潜意识中起着作用。春宝娘被丈夫以一百大洋典当给他人为妻，她的人格、尊严、感情完全被漠视了，完全被当成“传种接代”的“奴隶”。从知道要被典当那一天开始，无论是在破产的皮贩子家还是富庶的老秀才家，春宝娘都被圈在“家”中，可是，她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无家可归感，“她的思想似乎浮漂在极远，可是她自己捉摸不定远在哪里。”<sup>[5]</sup>(p.564)与同样以典妻行为为题材的作品——罗淑的《生人妻》相比较，《生人妻》注重的是女主人公外在的强烈的反抗行为，柔石则更关注的是春宝娘精神上的游移，那种缠绕着她的无着无落的恐惧折磨着她的灵魂，这正是小说用笔最深之处，也是作品震撼人心之所在。

小说创作伊始，柔石就表现出对流浪的极大关注，他早期小说描述的流浪行为中充满了浪漫情调，塑造的大多是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带有浓郁颓废气质的流浪者形象，体现了作者苦闷徘徊的心情。他关注流浪者内心的痛苦、灵魂的挣扎，那不被世人所容又拒绝容纳世人的孤独，与环境格格不入又拒绝融入环境的困惑。柔石同时也意识到，仅仅以流浪的方式立于社会的边缘，是无法寻找到摆脱这种心灵折磨的途径的，所以，他最终把朱胜瑀送入了旧时代的坟墓，他的流浪意识同时也多了一份反省。1928年后创作的小说集《希望》，则显示了柔石在创作上的转向，他“把写作重心

面向社会,面向下层民众,尤其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苦难深重的劳动妇女身上”[7](p.43),去洞透底层民众的悲苦,着力表现他们因受冷落而产生的孤独、空洞、绝望和虚妄等与流浪者相通的心境。柔石笔下萧涧秋的迷茫和彷徨、春宝娘内心的困惑和无助,都说明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漂泊感已深筑在他灵魂的腹地,并转化为他生命意识的一部分了。

### 三

按一定规范和程序构架的社会机制蕴涵着对人的异化,流浪就是以保持生命动态的方式来摆脱不自由,来对抗异化。流浪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早在荷马史诗中就出现了,它体现了人类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对生存状况的质疑,对合理归宿的诉求。由于流浪者并没有设定的目标或是肯定的标准,五四文学作品中的知识青年形象普遍“有着精神的空虚”,“感伤的旅程只能成为无目的的漫游”[8](p.78),但流浪者也具有共同的精神诱因——不满足于现状。原有的生存环境,原有的价值标准,原有的道德规范,都是他们要背叛的,要逃离的,但在流浪的过程中,他们又自然而然地以原有的作为参照,因为原有的一切已经在内心深处积淀成文化心理图式,他们后来所作出的判断又不得不依仗原有的标准,这是无法摆脱的悖论,由此,“逃离与眷恋”遂成为流浪心理的共同模式。流浪者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敏感、脆弱、飘忽、茫然,都与这样的心理矛盾有着直接的关联。作为主体鲜明、内心丰富的作家,柔石时时感受到生命的不可捉摸和命运的不可把握。他叩问人生:“我是自己的我么?”“依着命运摆布,似无舵之船的在海洋中飘流,目的之岸,万难抵达。”[2](p.5)“四海茫茫,五洲浩浩,我一粟耳!怎的总感受任何地之不能安我!”[2](p.13)在情感的选择中,他总是表现得犹疑而不安,面对着冯铿炽烈的感情冲击,他一方面承认冯铿给他带来了幸福:“今天我非常快乐,真是二十九年来惟一的日子,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2](p.170)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耽溺于情爱而愧疚,“因为在这个时代,紧要的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全副精神,都应该放在和旧时代的争斗上。”“恋爱,这不过是辅助事业的一种次要品。”由此联想到冯铿与前爱人许峨时,他就更加难以排遣“难解而且烦恼”[2](p.174)的心绪了。

柔石切身感受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形成的张力,深刻地洞察到他们纷繁复杂的精神状态。《V的环行》是一篇阐释知识分子心理的小说,每天晚饭后,V君绕着自己的住处环行,只有卖糖的老太太、烟纸店的老板、天真活泼的儿童引起他的兴趣,当这一切都变成了过去,“V的环行之愿完全消失了。变做沙漠上的旅行,冰冷的,孤寂的。”[5](P.481)主人公之所以会如此敏感于环境的变化,是因为他已经视内含于环境中的这些人文因素神圣化了,失却了这些人文景观,原有的生活对他而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他注定要逃离,但逃离的原因又是对心目中所认定的“原来”的眷恋,作者对这种含蓄而又敏感的心理把握是非常细腻独到的。

由此,笔者认为,柔石小说中的流浪现象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背井离乡又重归故土。《二月》故事,由主人公萧涧秋回到本是他故乡的浙江开始,这位“无父母,无家庭”的青年有充分的理由在天南海北流浪,“终因感觉到生活上的厌倦了,所以答应陶慕侃的聘请,回到浙江来。”[5](p.58)但历经了两个月的变故后,他终于无法接受流浪之外的人生方式,改变了原来要在这儿长期居住的打算,再次逃离了这一方故土,逃离了那由定居的人编织的爱恨情仇的“网”,继续那种漂泊无定的生活,“此后或南或北,尚未一定。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着美丽之花。”[5](p.185)掇拾着旧时代青年的苦闷与呼号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主人公朱胜瑞在异地他乡忍受着“生的苦闷”和“心的苦闷”,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只得回到风景宜人的老家山村,期望能抚慰受伤的心,但最终只能以自杀这样极端的方式宣告他的又一次精神逃离。流浪在外的游子在身心交瘁的时候,家庭、故乡特别

容易成为甜美的回忆，但此时对家庭和故乡的阐释，往往源于他们自我圈定的设想，只是记忆的碎片，虚拟的情境，其间的完美带有颇多假想成分。因此，当他们真正回归故土时，那种幻想的光芒又会荡然无存，流浪者不得不再一次选择流浪。家乡永远是“甜蜜的痛苦”，“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9](p.45)

其二，追求爱情又拒绝婚姻。流浪者躲避现实中的群体，寻找精神的沟通，而爱情总是与精神的完美、绝对、永恒相联接，别家流浪的日子里，情感上尤其感到孤独寂寞，因此，爱情是驱逐寂寞的最好安慰剂。在五四这一文化环境中，强烈地要求摆脱传统束缚、追求个性自由、争取爱情自主成了时代命题，但流浪者希冀的绝对精神上的爱情注定了他们在俗世中处处碰壁，只能以悲剧而告终，这就是五四文学中流浪者的爱情经常伴随着感伤或颓废的情感色调的原因之所在。田汉曾经在剧作《南归》中展示了流浪者的爱情世界：流浪者来到了南方，面对多情的南方姑娘，他想起了在北方的爱情；到了北方，他发现此时的爱情已经远离，他又来到南方；但他最终也没有在南方驻足，而是又开始了新的流浪……在流浪者的精神世界中，爱情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流浪本身具有的流动性使得爱情无法持续长久，追求爱情的亘古价值和无法安于不变的爱情使得流浪者在爱情面前总是表现出犹豫、徘徊，并拒绝爱情的社会化——婚姻。柔石的中篇小说《三姊妹》的主人公章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章先生自以为是“过去时代的浪漫派的英雄”[5](p.54)，因此，他以堂·吉诃德式的流浪骑士风范来作为自己行事的标尺，他客串于学界、政界、军界，情感也不断地在道德与欲望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也未能找到既让他人舒心又叫自己宽心的解决方案，“在房内愁眉的徘徊起来”[5](p.54)，“夜色冷酷的紧密的包围着他”[5](p.1)。同样的爱情模式还在柔石的《二月》、《旧时代之死》等小说中出现。萧润秋认可甚至赞同陶岚的爱情观，却无法接受她的实实在在的爱情，在同情文嫂的处境和理解陶岚精神之间，他无法选择、无从决定，只有“逃走之一法”[5](p.184)。朱胜炳因拒绝聘娶谢家女子，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身心烦恼，当他历遍人生甚至打算在清净的寺院中了却残生时，却被谢家女子惨死的消息扰乱了宁静的心绪，遂以自杀并与谢家女子合葬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赎罪。在这桩他所不愿意的婚姻中，他始终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却有因此带来的苦闷和烦恼。他对生命的感受是：“从此将变做断了生命之线的纸鸢，任着朔风的狂吹与漫飘，颠簸于辽阔的空际，将不知堕落到何处去了！”[5](p.196)这种甘愿放弃、无视本然的人生意念，又怎么可能去面对那现实而又庸常的婚姻呢？游移的心绪和犹疑的心态，正反映了浪子是那种冷观而又无法摒除爱念，避俗又不能根除热情，尽是些“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10](p.149)的落入尴尬境地的人。

在柔石的小说创作中，流浪被作者用来当作消除个体内心感受和外部世界刺激造成的张力，以求得心态暂时平衡的良药，具有心理代偿的功能，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现象，而不是简单的行为方式。柔石将流浪视为严肃的哲学命题，与游戏人生和自我麻醉者相比较，“他笔下的青年虽然彷徨，但并不绝望”，都是一些“苦闷时代里执著地寻找前进道路的探索者”[1](p.31)。与五四落潮后普遍的悲观、颓废和厌世相比较，他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流浪精神气息，往往能给人以鼓舞和感动。而那些在苦闷中徘徊却依然顽强的寻路者，也显示了柔石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坚韧的人生态度。

柔石小说体现的精神流浪现象，代表了被五四精神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担荷和追求，也使长期被主流意识形态压抑、遮蔽的声音得到了释放。“逃离与眷恋”构成了流浪的内在张力，既表现为尘世的涤除和灵魂的逃逸，又体现了对故家的思念和对传统的留恋。随着社会化、群体化倾向的加剧，“逃离”逐渐受到来自内在和外在的限制而放慢了脚步，由于心灵的孤独和精神的寂寞积聚的能量相应地减少，强烈地眷恋和迫切地思“家”的心绪则得到了适时的满足。当流浪者无可逃离时，眷恋不存在了，精神流浪也就终止了。在柔石后期的创作中，孤独感伤的流浪者形象日趋减少，而坚忍地转为对苦难的描述，迷幻、漂移的文风也逐渐转化为明确而又肯定的论述；第一人称的内心独

白成分逐渐减少,对他者的客观而冷静的叙述日趋增多,显露出由革命文学潮流影响而产生的文学变迁。柔石小说的流变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流浪现象的走向,普罗文学中大量以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形象有着明确的理想目标和行动指向;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有着明确目标的离家出走后来成功走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不再只是时刻承受孤独的流浪者,而是最终总能找到灵魂的归宿。当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集中和统一的社会生活终于使得流浪形象在“文化大革命”文学中销声匿迹,精神流浪最后终于失去了存在的空间,集体的迁移代替了个体的流浪。直至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后,社会逐渐解禁,流浪再一次诱惑了要求摆脱束缚、寻找更大自由空间的人们,流浪遂再一次成为阐释生命意义、寻找人生答案的文化行为。

### [参考文献]

- [1] 郑择魁,黄昌勇,彭耀春.五烈士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 [2] 赵帝江,姚锡佩(编).柔石日记[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 [3] [德国]威廉·狄尔泰(艾彦译).历史的意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4]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5] 乐齐(主编).青年和妇女的人生写照——柔石小说全集:卷二[Z].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 [6] 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 [7] 张小红.左联五烈上传略[M].上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8] 李欧梵.孤独的旅行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我形象·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2000.
- [9] [美国]爱德华·W·萨义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
- [10] 鲁迅.鲁迅全集:卷二[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徐 枫]

## Escape and Nostalgia: the Drifting and Homeless Complex in Rou Shi's Novels

Chen Li-jun

(College of Art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Wandering is not only spiritual and cultural, but it is also a form of life experience. To the modern people, it has a sense of drifting, a sense of remoteness and loneliness.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suddenly found themselves culturally homeless. Spiritual wandering becomes a popular literary topic for some writers. Rou Shi is one of them. In Rou Shi's novels, spiritual wandering results from his age, and his personal sufferings further deepens his strong sense of being a spiritual loafer.

In the modern society,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his surroundings is gone. People are frequently haunted by feelings of nameless anxieties, loneliness and spiritual vacillation. Drifting, as a way of verbal representation, typifies the call on the modern people for a spiritual homeland and questioning the existing life and appealing to the return of a better and ideal dwelling. In modern novels, drifting goes in two directions: as a way to extricate him/her from a materialized predicament; and as a way to free him/her from spiritual disturbances.

Rou Shi creates a series of “spiritual travelers in wilderness”, of which most are spiritually harried and

their down-to-earth miserable predicament is vividly depicted. Through his characters, such as Xiao Jianqiu (*the confused and vacillated*) and Aunt Chun Bao (*the desperate and helpless*), Rou Shi, shows us that the sense of drifting is profoundly lodged in the innermost part of his heart and is an alienated part of his life.

Rou Shi is concerned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soul and outward action of the characters at the shifting point of new and old cultures. Those spiritual loafers, dithering in dejection but still strong-minded, are characterized as a psychological "escape-and-nostalgia" type, represented in the pattern of "fleeing-home-and-return". Home and native land, in the mind of the loafers, is still a sweet memory and imagined perfection. The return to the homeland means that they are endowed with a second chance to escape. Their rejection of marriage means their having a second chance to resume their love. In their spiritual world, the loafers value love over everything else, but the mo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a wandering life inevitably frustrate them in perpetuating their marriage in real life.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stantly delayed love and the marriage in real life will forever remain unsolved in the life journey of the loafers.

In Rou Shi novels, drifting is an embodiment of a spiritual pilgrimage of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Along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the author in wide social activities, this spiritual wandering in Rou Shi's later works slows down and the drifting images gradually give way to those that are ready to be involved. This emerging trend foretells the direction of the spiritual wandering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literature; homelessness; spiritual loafers; escape and nostalgia

## 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信息产业的发展对传统的法律制度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出现了不少权利义务规制的真空地带。对数据库的保护就是其中一例。数据库是以系统或有序的方法编排的、可以通过电子或其他方式单独访问的独立作品、数据或其他数据资料的集合。由于数据库的制作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而他人却可以远远低于其制作成本使用该数据库,因此,必须给予数据库制作者一定的保护。我国一般把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加以保护,但汇编作品保护的只是汇编者所创造的部分,而不涉及已有的部分,因而,只能保护数据库的“独创性的选择和编排”,而不涉及数据和材料的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数据库制作者虽能获得一定的保护,但却不能阻止他人使用数据库内的材料,只要该材料在选择或编排上与原汇编作品不同就可以了。这种对数据库的弱保护单纯依靠著作权法是无能为力的,但可以借助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补救。合同法可以使创作者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收回投资;而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则能够弥补著作权法(如独创性的界定等)的弊病,防止合同法对第三人侵权行为的规制漏洞,并弥补对公众合法利用信息保护的不足。

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范围极广,但与著作权法相比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各国在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时,都未把窃取数据库制作者劳动成果并加以商业运用的行为包括在内,从而导致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只能适用总括性条文。而总括性条文具有相当的抽象性与不确定性,使数据库制作者很难预见自己是否能够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我国对数据库的保护应从充实与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来考虑,既要保护数据库制作者的利益,又要兼顾其他合法使用人的利益。从保护的范围上来看,首先,受保护的数据库应包括电子数据库和非电子数据库。其次,对构成数据库的内容不必过分加以限定。任何有价值的作品、作品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其他材料都可成为数据库的内容。最后,因为数据库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我们还要排除整体上的单个作品。对侵权行为的界定,应仅限于营利性行为或给权利人的基本市场或相关市场造成较大损害的行为。但为了更好地发挥数据库的作用,应对诸如学校、图书馆等公益事业单位的侵权责任加以必要的限制;为了扶持网络服务业的发展,对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也应作出必要的限制。笔者认为,采取的主要对策应着眼于减少或免缴金钱,或者在侵权责任的认定上采用较宽的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仅通过著作权法对数据库进行保护则力度不够,而采用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又具有不确定性。但基于对数据库进行保护的根本目的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宗旨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较好的方法是通过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来弥补著作权法的弱保护性,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数据库的制作者的权利,又兼顾公众利益,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数据库产业的健康发展。

(徐 柯)